史海掠影

民国时期老黄县照相业管窥

□郝祖涛

晚清时期，胶东半岛的芝罘（烟台）、威海、青岛等地都出现了专业照相馆，其中芝罘（烟台）于1895年在东马路开设翠阳照相馆；1899年，威海开设兆芳照相馆，青岛开设盛永发照相馆。一度担心照相“能够摄走人类魂魄”的胶东人，逐渐喜欢上了照相，包括老黄县在内的一些县城，相继引进时尚的照相技术，照相馆开始设立并逐渐增多，以满足官员、商绅、富豪以及特殊身份人员的消费需求。

黄县西关美术照相馆拍摄的双人照。

1935年黄县真光照相馆拍摄的黄县商业公余俱乐部成员合影。

西方先进照相技术在国内传播后，素有经商传统的老黄县商人抓住商机，在民国时期陆续创办了很多照相馆，营业网点遍及境内繁华路段。这些照相馆围绕市场消费需求，在拓展经营项目、加大投入力度、完善服务内容、树立商家品牌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。老黄县照相馆经历了从无到有、由兴到衰的曲折变化，留存至今的民国老照片见证了当地照相业曾经的辉煌。

时尚技术较早落户老黄县

19世纪30年代，具有革命性的照相技术在西方国家诞生后，美国人乔治·韦斯特于1845年在香港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照相馆。照相技术由南向北推广传播，国人学习掌握后“购药水器具，开设照相楼，延及各省”（葛元煦撰著《沪游杂记》，1887年）。

晚清时期，胶东半岛的芝罘（烟台）、威海、青岛等地都出现了专业照相馆，其中芝罘（烟台）于1895年在东马路开设翠阳照相馆；1899年，威海开设兆芳照相馆，青岛开设盛永发照相馆。一度担心照相“能够摄走人类魂魄”的胶东人，逐渐喜欢上了照相，包括老黄县在内的一些县城，相继引进时尚的照相技术，照相馆开始设立并逐渐增多，以满足官员、商绅、富豪以及特殊身份人员的消费需求。

1985年的内部资料《黄县饮食服务行志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志》）记载，早在1924年，万某某创办的照相馆设址于黄县城内南巷，时有店员3人，经营用房3间。20世纪30年代，是黄县城照相业发展的兴盛时期，照相馆总数累计有13家之多，这在一般的县城中是不多见的。其中，1931年至1938年期间新开办的照相馆就达12家，包括岐山照相馆、真光照相馆、顺兴照相馆、万青照相馆、美青照相馆、美美照相馆、振华照相馆、晶文照相馆、华成照相馆、新时代照相馆、真光铭记照相馆以及东亚照相材料行（经营照相、照相材料）等，有7家照相馆开设在大、小十字街口，余者则位于财神庙、西关街、西阁外等处。1939年日寇侵占老黄县期间，城内仍有5家新照相馆开业，分别为新声摄影社、益友照相馆、怡兴照相馆、美华照相馆、震东照相馆。创办于1942年的“怡兴照相馆”只经营了短短的2年时间。

1947年国民党部队进攻胶东期间，照相业遭受重创。到1949年，黄县城的在营照相馆仅剩下5家。其中，1932年设立的“顺兴照相馆”持续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后来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，是民国时期老黄县照相业经营历史最长的照相馆。

《行志》记录显示，龙口在1936年有2家照相馆。一家名为“华昌美术照相馆”，店主为解纯焕，有6名店员、5间经营用房，1940年改称为“天真照相馆”，一直经营到1956年公私合营，是龙口雇工最多、续营时间最长的照相馆；另一家叫作“渭滨照相馆”，店主为田渭滨，计有3名店员，在经营9年后的1945年歇业。到了1937年，刘松田创设的松竹照相馆开业，经营用房达到6间，为当地经营用房最多的照相馆。民国时期，龙口照相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即营业地址均选择在时年比较繁华的维新大街上，或者路东或者路西，即便是1953年开办的艺华照相馆也设址于此。

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现的照片实物和历史资料，民国年间，老黄县还有很多《行志》未记录在册的照相馆，如黄县城的永真照相馆、西关美术照相馆，龙口的宝华美术摄影社以及北马照相馆等。根据统计，民国时期老黄县累计开办的照相馆至少有27家，到1949年时仅有6家维持经营。

投入创新意在招徕消费者

照相业是一个对专业技术要求极高的行业。在现代数码拍摄技术出现之前，照相馆内设的摄影、暗室、整修、着色等专业工种分工极其明确。而在民国时期，出于技术保密和行业竞争需要，老黄县只有生意较好、店员较多的大照相馆才有类似的分工，店家设有严格的规定，不允许各工种间偷窥、打探、暗学，以防伙计别有用心。大店也好小店也罢，诸如拍照、冲洗、印片、放大、修版等全套技术，基本都由店主或其至亲掌握。但对于商号外聘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店主反而默认甚至鼓励身边的伙计主动与师傅搞好关系，以便尽快学习并掌握关键的照相技术，争取早日出徒成为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，也好为东家节省些外聘师傅的费用。

民国时期老黄县的照相馆，既有独资单干的，也有合伙经营的，营业用房多数属于前店后场式的连家店。兴起初期，这些店的设备条件都十分简陋，均以露天庭院或搭棚当作摄影场地，底片则需在内屋的暗室里冲洗。在没有电光源的年代，拍照、晒相、放大全靠自然光，遇到阴雨天什么都做不了。设备条件一般的照相馆只有旧式三角木架外拍机，配备6—8寸摄影镜头。照片放大普遍使用相机镜头代替放大机，操作时安放在营业室的窗户上，借助日光扩放。晒相时则将感光纸放在照相底片下、夹入晒相盒，在阳光下曝光，后经显影、定影而成。照相所需的各种材料，像底片、相纸、药品之类，因无国货产品，全部仰仗洋货供给，从天津、济南、青岛、烟台等城市采购。1934年，黄县城设立“东亚照相材料行”后，老黄县的照相材料主要由其采供，包括柯达（美国产）、富士（日本产）玻璃底片，柯达（美国产）、爱克发（德国产）相纸等。

老黄县照相业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内部竞争却十分激烈。除日常热情周到待客之外，各家既适时增加投入改善设备以及店内环境，又注重在专业技术上借鉴创新，以此吸引顾客，扩大市场份额。“真光照相馆”是袁君集（音）在1931年创办的，1934年出兑给罗铭山，由后者改名为“真光铭记照相馆”，属于老黄县实力较强的照相馆之一，购进的配备有大座机和可照12寸相片的德国蔡司12寸镜头，提供人像之外的外拍及大型团体照业务，店里搭建有4间玻璃房照相室。所谓的“玻璃房”，是因照相业早期没有电源，都是靠自然光线，故在影棚房间顶部安装大面积的透光玻璃，室内则悬挂各色布帘调节光线，下面用反光板打辅助光。当年黄县城的万青照相馆也有玻璃房，比真光照相馆的规模小，日寇侵占老黄县期间被鬼子的炮弹给炸毁了。

除了加大硬件投入，老黄县照相业还极为重视品牌标识的设计应用，做好形象宣传文章。比如在摄影室内环境布置方面，诸多照相馆铺设有拍照人像用的各式花纹地台，房间背景墙设有装饰布景，有的是田园景观，有的是山水风光，有的是亭台楼阁，有的是洋式厅房等。

现存黄县城华成照相馆拍摄的三人合影照片、西关美术照相馆拍摄的双人合影照片，整个画面人物、布景、地台无缝衔接，很自然地融为一体，显示出了很高的景台艺术水准。再比如，在成品相片装裱方面，各家照相馆用来镶贴照片的背板正面，均带有繁简不同的花纹边饰、商标标志，落款注明商号名称、经营地址、服务项目，甚至使用中英文双语标注；许多经营理念先进的照相馆，还非常注重根据所拍照人物的彼此关系，将体现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，艺术化地设计在背板正面，使相片装裱画面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。其中，“宝华美术摄影社”为一对母子照装裱的相片背板，画面上半部、右下部展现的是太阳和光束图案，表达了孩童在母亲呵护关爱下健康成长的含意；“华昌美术照相馆”为一对夫妻照装裱的相片背板，画面左下部呈现的是帆船图案，寓意夫妻生活同舟共济、一帆风顺；“西关美术照相馆”为两位年长女性照装裱的相片背板，画面左下部为湖水风光，由太阳、柳树、水纹、小船等诸多景观组成，小船上一对情侣卿卿我我，借喻合影女性的亲密关系。

还有一些照相馆的照片装裱背板上，直接向客户展示技术特长。如“华昌美术照相馆”为单身男性照装裱的背板画面，除列明照相馆的商号名称、营业地址以及汉语拼音外，画面上还醒目地书有“艺术/摄影”美术字体；“永真照相馆”为三名男性照装裱的相片背板，整体画面则非常简洁，右下角的美化图案由梅花和文字组合而成，其中的文字标注有“永真照像/各种放大”的字样，体现了自身与众不同的专业优势。

拓展经营弥补主营业务收入

西方照相技术传入我国后，国人对此曾产生过不同的认识。一方面，推崇赞美者有之。如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，对与之有姻亲关系的金石巨擘陈介祺所寄的“新装洋照”极为欣赏，盛赞其“精妙无双”，认为“即照行乐等事，游子可以寄家慰亲，老人可以寄外示子，亦至妙之用”（王懿荣撰、邱崇辑释《王懿荣书札辑释》，齐鲁书社，2022年）；另一方面，畏惧猜忌者有之。主因是信息传播中的真相与讹传掺杂，科学与迷信并行，民间对照相技术的成像原理知之甚少，一度被称为“摄魂”“妖术”，甚至闹出了很多荒诞不经的笑话。

尽管如此，老黄县作为胶东半岛的传统商区，随着民风渐开，加之居民“生齿日繁”，经济“逐年增加”，风俗“渐习奢华”，人们对于照相技术这类先进的新生事物接受较快，嗅觉敏锐的商家抢占先机投资设店，围绕消费者需求开展商业化经营。彼时，老黄县照相馆推出的服务项目有室内照和室外照、人像照和风景照，规格尺寸从1寸到12寸不等，既能原版拍照又可将小片放大。新颖时尚的黑白照片在民间颇为流行，不仅有单人照、双人照、三人照、多人照，还有团体照。比如，1928年由黄县商会筹备组建的黄县商业公余俱乐部，每当辖区内有店铺开业、店庆、节日或庙会等活动，都要按照商会的要求到场助兴演出。1935年元旦，公余俱乐部参加完一年一度的祭祀财神演出后，根据商会主席范循约的安排，在县城财神庙拍摄了集体合影，共有17人上镜。其中，前排就座者9人，为鼓师、琴师等乐器演奏者，中后排站立的8人当为演员，照片题有“黄县商业公余俱乐部民国廿四年元旦摄影”字样。这张照片的拍摄商家，即黄县城内具有大型团体照能力的“真光照相馆”。

民国时期，老黄县照相馆为了拓展业务，采取了广告引领、上门推介等多种促销办法。在服务方式上，既坐店候客，热情接待每一位到店拍照的顾客，又配备新式快捷的脚踏车，以便摄影师携带照相器材走街串巷、进村入户，为预约的顾客提供上门拍照服务。那时候，照相是很时尚的消费项目，价格自然不菲，有能力消费的只是官商富裕阶层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是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，这就导致照相的受众群体相对较少，单纯依靠照相收入维持运转不太稳定，因而从事照相业的店家，都尽可能地兼做其他生意，以弥补主营业务收入。以黄县城照相馆为例，除主营照相业务外，兼营刻印生意的有万青照相馆等，兼营钟表维修生意的有岐山照相馆、万青照相馆、怡兴照相馆、真光照相馆等，兼营镶牙生意的有岐山照相馆、万青照相馆、怡兴照相馆、震东照相馆、西关美术照相馆等。其中，“西关美术照相馆”成品照片装裱的背板就同时标注“美术照相/美华牙社”两个字号；岐山照相馆、真光照相馆、万青照相馆等都附设车辆修理部，兼营脚踏车维修业务。

老黄县照相馆商号的命名多种多样，除传统吉祥的商业用语外，有择取店主姓名中两字冠名的，如张岐山的“岐山照相馆”、田渭滨的“渭滨照相馆”、孙震东的“震东照相馆”、曲万青的“万青照相馆”等；有单选店主姓名中一字借指的，如罗铭山的“真光铭记照相馆”、陈鼎新的“新时代照相馆”、陈冶新的“新声摄影社”、温华山的“华成照相馆”、赵吉友的“益友照相馆”、刘松田的“松竹照相馆”、赵□文的“晶文照相馆”等。

民国时期，国内很多地方的照相馆名称以“照像馆”作为指代，这在旧时的老黄县也不例外。其中，笔者所见老黄县8家商号成品照片的标志，有3家落款为“照相馆”，有5家标记为“照像馆”。在中国的汉字中，“相”是对事物样子的瞬间捕捉，生成静态的客观存在物；“像”则是相似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为“比照人物制作的形象”，如画像、塑像、绣像、肖像等。民国年间的照相馆用“照像”而非“照相”二字，这既有早期汉语用字规范较宽松的原因，还有方言表述问题，或许还与照相馆自身规避失误纠纷有关。因为初期的照相技术不稳定，导致照片失真、模糊的情况时有发生，成品照片出现“相似”的状况不足为奇。现存老黄县“北马照相馆”的装裱照片显示，其背板画面上除了简洁的干枝梅图案外，只有“北马仿真”四个字，这似乎能够诠释“照像”一词的含义。

民国时期老黄县照相馆的创办运营，为当地传统的商业领域增添了新的服务项目，促进了照相技术的推广传播，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尤其在记录历史瞬间、定格时代样貌、留存风土民情等方面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一条红色情报线

□曹景广

为了高效传递情报，杨彩荣精心搭建起一张严密的情报网，织就了一条连接敌后与根据地的红色情报线，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、暗藏玄机：

朱桥镇伪区长李曰乾是朱桥村人，中共党员，由朱桥区党组织派遣潜伏，负责统管辖区内的各乡伪乡长。巧的是，李曰乾的二连襟，正是西曲城村杨彩荣的本家族兄杨彩藻，两人也因此成了族连襟。凭借这层隐蔽关系，李曰乾能轻易获取朱桥据点日伪军的动向情报，并第一时间传递给杨彩荣。

杨彩荣接到情报后，以“修鞋”为掩护，将情报巧妙地转交给化装成修鞋匠的族侄杨之君。杨之君每天往返于朱桥与曲城之间，看似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，实则是情报传递的“交通员”。

杨之君带着情报赶回曲城后，再通过族叔杨彩藻的外甥、同乡盛家村人曲绍昌，将情报送到盛家村首位共产党员曲佐令的手中。曲佐令以“王剑秋”为化名，将情报安全转交给根据地的党组织负责人。

除此之外，杨彩荣还安排可靠同志刘全德出任西曲城村伪村长。每当侦知日军有进犯曲城乡的行动时，杨彩荣便迅速通过情报线通知刘全德，由他及时转告东曲城村、李格庄村、洼子村的村长。待日伪军进村时，刘全德便按照事先约定，假意“摆桌备水”周旋应付，以此巧妙化解危机，最大程度减少了村民遭受欺压的次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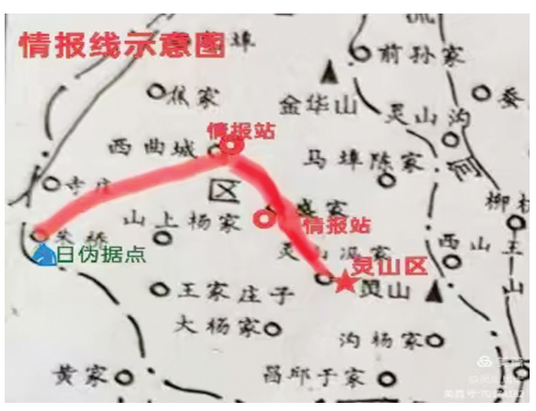
力挽狂澜

这条红色情报线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。1939年春，朱桥据点的日伪军经过多方打探，得知数年来国军、八路军的部队时常驻扎在西曲城村曹家大院，遂将这座宅院列为重点清剿目标。一天，日伪军向驻青岛的上级申请，密谋于次日清晨派飞机轰炸这座共产党组织的临时驻地——曹家大院。

万幸的是，当天下午，李曰乾便从伪军队长口中截获了这个惊天情报。他不敢有丝毫耽搁，火速将消息转告给杨彩荣。杨彩荣接报后，立刻通过红色情报线层层传递，警报飞速传至根据地。党组织负责人当机立断，连夜组织大院里的机关人员和物资紧急转移。

次日清晨，两架日军轰炸机果然飞临西曲城村上空，朝着曹家大院投下两颗大型炸弹。一颗炸弹在北部房群中轰然爆炸，瞬间将院内新建的房屋炸成一片废墟；另一颗炸弹则落在南大门处，万幸被大门垛与南屋山墙死死夹住，最终未能引爆。据当地人回忆，这颗炸弹威力巨大，若是当时爆炸，恐怕西曲城半个村子的房屋都将毁于一旦。

一场灭顶之灾，因这条红色情报线的及时运转而消弭于无形。那些潜伏在敌后的无名英雄，用智慧与勇气守护了一方百姓，也为招远的抗日斗争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隐秘篇章。



密径蜿蜒隐野荒，暗传星火破晨光。
匠心藏尽千钧令，袖底携来百里霜。
不畏刀丛探虎穴，敢凭孤胆护忠良。
一条红色情报线，无声战线昭丰碑。

罪恶倭寇侵我中华，犯我疆土。铁蹄踏碎河山秀色，黎民深陷水火之中。华夏大地悲歌四起，硝烟漫卷万里神州。面对外敌的侵略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，共同抵抗。

曹家大院

清末民初，胶东大地灾荒频仍，黎民百姓生计维艰，无数青壮年为求活路，纷纷结伴“闯关东”。西曲城村亦有不少人踏上这条路途，可真正闯出一番名堂的，寥寥无几。不过，远赴哈尔滨的曹家幸运地成功了。发家后的曹家返乡置地，在村里建起一座气派的宅院，打算安享家园，却未曾想，这座宅院日后会与一段烽火岁月紧密相连。

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华夏大地山河破碎，狼烟四起。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遵照指令，派展书堂率领八十一师一部进驻招远，督挖战壕以抵御日军入侵。八十一师的师部，设在西曲城村西北头闲置的曹家大院里。这座尚未入住的宅院分为东西两跨。东跨为住宅区，朝南的大门内，一条花岗岩条石铺就的通道笔直地通向北院墙，两侧各矗立着八幢房屋，花岗岩细凿而成的底座沉稳坚实，手磨青砖砌就的墙体工整细腻，青瓦起脊的屋顶错落有致，堂屋、卧房、厅堂、库房一应俱全；西跨则开有朝北的大车院门，院内空阔敞亮，用作屯粮、驻兵的综合场地，周边依序建起仓库、冷库、车马室，西南角还设了两间对外开门的碾屋，专供村民碾米磨面，尽显曹家当年的实力与格局。因日军侵华的战火步步紧逼，曹家阖家迁往哈尔滨避难，这座空宅便成了八十一师的驻防中枢所在。

隐蔽战线

据1991年版《招远县志》记载，1938年8月，中共招远县委在九曲村正式成立，其核心任务便是发展革命组织、建立人民武装、筹建抗日根据地。在这股革命浪潮的感召下，西曲城村第一名中共党员杨彩荣挺身而出，毅然踏上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。

随着日军侵华图谋的调整，招远抗日根据地成了敌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日军不仅对根据地展开残酷的大扫荡，还在各地扶植区、乡、村伪政权，妄图割裂军民联系，扼杀抗日火种。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，我党果断采取对策，安排一批骨干力量潜伏敌后，杨彩荣便是其中的关键一员。经灵山区第一任区长李萍实的周密安排，他以“曲城乡伪乡长”的身份，潜伏在朱桥镇日伪据点的辖区内，开始了隐蔽战线的殊死较量。

一条红色情报线

为了高效传递情报，杨彩荣精心搭建起一张严密的情报网，织就了一条连接敌后与根据地的红色情报线，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、暗藏玄机：

朱桥镇伪区长李曰乾是朱桥村人，中共党员，由朱桥区党组织派遣潜伏，负责统管辖区内的各乡伪乡长。巧的是，李曰乾的二连襟，正是西曲城村杨彩荣的本家族兄杨彩藻，两人也因此成了族连襟。凭借这层隐蔽关系，李曰乾能轻易获取朱桥据点日伪军的动向情报，并第一时间传递给杨彩荣。

杨彩荣接到情报后，以“修鞋”为掩护，将情报巧妙地转交给化装成修鞋匠的族侄杨之君。杨之君每天往返于朱桥与曲城之间，看似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，实则是情报传递的“交通员”。

杨之君带着情报赶回曲城后，再通过族叔杨彩藻的外甥、同乡盛家村人曲绍昌，将情报送到盛家村首位共产党员曲佐令的手中。曲佐令以“王剑秋”为化名，将情报安全转交给根据地的党组织负责人。

除此之外，杨彩荣还安排可靠同志刘全德出任西曲城村伪村长。每当侦知日军有进犯曲城乡的行动时，杨彩荣便迅速通过情报线通知刘全德，由他及时转告东曲城村、李格庄村、洼子村的村长。待日伪军进村时，刘全德便按照事先约定，假意“摆桌备水”周旋应付，以此巧妙化解危机，最大程度减少了村民遭受欺压的次数。

力挽狂澜

这条红色情报线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。1939年春，朱桥据点的日伪军经过多方打探，得知数年来国军、八路军的部队时常驻扎在西曲城村曹家大院，遂将这座宅院列为重点清剿目标。一天，日伪军向驻青岛的上级申请，密谋于次日清晨派飞机轰炸这座共产党组织的临时驻地——曹家大院。

万幸的是，当天下午，李曰乾便从伪军队长口中截获了这个惊天情报。他不敢有丝毫耽搁，火速将消息转告给杨彩荣。杨彩荣接报后，立刻通过红色情报线层层传递，警报飞速传至根据地。党组织负责人当机立断，连夜组织大院里的机关人员和物资紧急转移。

次日清晨，两架日军轰炸机果然飞临西曲城村上空，朝着曹家大院投下两颗大型炸弹。一颗炸弹在北部房群中轰然爆炸，瞬间将院内新建的房屋炸成一片废墟；另一颗炸弹则落在南大门处，万幸被大门垛与南屋山墙死死夹住，最终未能引爆。据当地人回忆，这颗炸弹威力巨大，若是当时爆炸，恐怕西曲城半个村子的房屋都将毁于一旦。

一场灭顶之灾，因这条红色情报线的及时运转而消弭于无形。那些潜伏在敌后的无名英雄，用智慧与勇气守护了一方百姓，也为招远的抗日斗争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隐秘篇章。